

清末温州后学眼中的孙诒让

◎ 浙东人物 □ 刘晓东

孙诒让(1848~1908),字仲容、仲颂,别号籀廔,浙江瑞安人,晚清著名经学大师,与德清俞樾、定海黄以周合称清末三先生,是传统朴学的殿军人物,《清史稿》有传。孙诒让同治六年中举人,曾官刑部主事,旋归故里不再复出,一生潜心学术,培育家乡人才,在清末温州教育界、学术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。林骏(1863~1909),原名宝熙,瑞安城关人,著有《林骏日记》。刘绍宽(1867~1942),字次饶,平阳县江南白沙刘店人,著有《刘绍宽日记》。林骏和刘绍宽作为孙诒让的同郡后学,和孙诒让均有往来,两人今存的日记记载了当年他们和孙诒让的交往情况,从中可以窥豹一斑,让我们了解到当时温州青年人笔下的孙诒让。

排忧解难的乡绅孙诒让

孙诒让的父亲孙衣言、叔父孙锵鸣均曾中进士并入翰林,兄弟二人学问精博,宦海数十年,在海内颇为闻达。这样的显赫家世和深厚家学,使孙氏在瑞安乃至整个温州府简直如神一般存在,是普通士人的精神领袖,许多人遇到难办的事情时首先便会想到孙诒让。现存的《林骏日记》始于光绪二十三年(1897),这一年十月十七日,孙诒让的叔叔孙锵鸣通过林骏的老师洪楫园“过舍,约订明春孙学士馆事”,从此林骏和孙氏开始了较为密切的来往。次月,林骏碰到了一件重大且棘手的事情,他马上想到了孙诒让。十一月廿六日“同往访仲容先生,托以要事(按:指陈家森葬林骏祖塋),先生亦为之扼腕,自言愿出臂以相助。余不胜感激”、十一月廿七日“夕,善盗发乡贤家墓公禀二纸,呈孙刑部”、十二月初三日“过孙仲容先生,酌议文案事”,两个月里三次会商,足见林骏多么倚重孙诒让。刘绍宽于光绪二十五年(1899)二月初七日和孙诒让第一次见面,“谒孙仲容先生,袖奉仲愚母舅一函,以蔡桥郑宅社仓事,托仲丈商之许竹友师”,显然是有事相托而来;光绪三十一年(1905),刘绍宽碰到了一件可大可小的困难事,该年“乡民积怨,纠众往鳌江尽毁公棧,并拆方铭之屋。于是王维善、方铭等直控余为主使,幸道、府皆事先得知底细,孙仲丈又从中左右之,王、方等计不得逞”,如果不是孙诒让从中平衡疏通,刘绍宽很难保证不会陷入尴尬困境。出了难事、急事,后学者第一时间想请孙诒让帮忙,这可以看出孙氏当时在温州一带的特殊地位和办事能力。

良师益友的孙诒让

孙诒让不但朴学功底深厚,诗文方面也有一定的造诣,因此在瑞安当地以及温州全府,雅集谈宴少不了他的身影,后学者也常以躬逢盛会为荣。光绪二十三年(1897),林骏的日记有两次记录了和孙诒让诗酒交往,十月廿六日“余偕孙仲容先生、郑一山兄、洪君小石、胡生绳孙、耕经坐洞房中饮酒”,十二月初八日“余同孙刑部前辈坐颐园论诗文良久”;光绪二十四年(1898)八月廿八日“午刻,家仆报张震轩妹丈来,饭后同去谒孙仲容先生,谈事甚久,至暮辞别”;光绪二十五年(1899)二月初三日“与仲容先生、戴藏仙、叶耕经,坐辛夷花下清潭良久”;光绪二十九年(1903)四月廿六日“谒孙仲容先生,座谈颇久”。相比于林骏和孙诒让同处一城的交往便利,刘绍宽到访多为去温州路过瑞安孙宅,访客的性质决定了其来也匆匆去

也匆匆,作为晚辈后生的礼节性拜访较多。光绪二十六年(1900)正月十七日“同君雅至瑞安,夜宿孙仲容先生宅”,光绪二十九年(1903)十月廿三日“晓至瑞城,在德星馆早饭,遂与志凯同谒孙仲容先生”,光绪三十一年(1905)九月十七日“余与君雅则过访仲容先生也。夜自赴郡”,光绪三十二年(1906)二月十三日“自县城赴郡,过瑞安孙丈,晚膳后上航船”。虽然刘绍宽并非孙诒让瑞安同乡,但由于刘绍宽母舅杨纯约(号筱溪)、杨镜澄(字仲愚)均为孙诒让父亲孙衣言的人室弟子,两家是世交,刘绍宽在孙诒让心目中的地位其实要比林骏高。刘绍宽经常去拜访孙诒让甚至留宿,这是林骏所无法比拟的。比如光绪三十二年(1906)二月十九日“得孙丈复信,言杭州之行不如略缓。又云官场事最不易测度,往往闻声相思,一见却甚淡漠,嗒然失望者。又云官场大忌绅士占桌面子。皆阅历之言”。孙诒让能跟刘绍宽讲这些官场潜规则的掏心窝话,显然已等同自家子弟视之矣。

办学兴教的倡导者孙诒让

孙诒让晚年特别注重家乡人才培养,光绪二十四年(1898)孙诒让在瑞安创设务农会,“欲借籍田为之倡也”,遭到了林骏的反对,“余屡不允其假,有拂同会诸君之意,群起怨言。和叔劝余暂为假之,必不作荆州久借矣。勉强应允,约以明日订定”。由于林骏家庭较为贫寒,一时从自身考虑出发,也可以理解。但林骏毕竟也是一位教育有心人,光绪二十七年(1901)十二月初十日“夕,孙仲容先生邀管杏浦、周晓秋及余到学计馆集议,谓三隅蒙学堂已办,只西北未开,诸君必须竭力举行,不可作向隅独立之观。同人允为创举,但答以经费难筹耳”,当面对开办西北蒙学困难的时候,林骏还是义无反顾地和大家一起迎难而上去积极解决。该年十二月十八日“管杏浦、饶翼民邀余过孙仲容、胡蓉村二先生处,商议开办西北蒙学”,终于在次年光绪二十八年(1902)正月廿一日“晨刻,西北蒙学开馆”,有力地响应了孙诒让的号召。刘绍宽在办学上更是孙诒让的左膀右臂。光绪三十一年(1905),温州、处州联合设立学务分处,推孙诒让为总理,刘绍宽加入孙诒让团队,两人开始同事共处。光绪三十二年(1906)三月十五日“夜得悉京电,举孙仲丈为中学正监督,余与吴郁副之”,随后两人为了温州中学堂的办学事宜会商不断,孙诒让对刘绍宽给予了充分认可,四月初三日“中学监督事,孙仲丈旋独保荐余专任之”。当刘绍宽在实际主持办学过程中遇到困难时,孙诒让积极出谋划策,同四月十九日“孙仲师信来,言可行姚崇十事之策云”。由于孙诒让的力挺和刘绍宽办事的干练,两人共同把温州中学堂的办学水平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

有学问的风雅领袖孙诒让

孙诒让的学问世人有目共睹,同乡晚辈多以能亲聆教诲为荣。光绪二十九年(1903),林骏聆听了孙诒让的多次演说:



孙诒让画像

正月十五日“夕,往明伦堂听演说,主讲者孙仲容刑部”,五月初一日“夕,诸生到明伦堂听演说……主讲者孙仲容先生”,八月十五日“夕,开演说第十七会,主讲者陈介石进士、孙仲容主政”。林骏具有不错的传统学问功底,孙诒让的朴学代表作《周礼正义》的校订便有林骏一份不可磨灭的功劳。光绪二十四年(1898)七月初九日“申后,同仲恺公子去谒仲容先生,以先生所著《周礼正义》授余分校也。余坚辞识见固陋,不足当此任,先生不允,遂袖其书而归”。此后,林骏在七月十三日起共17天日记里有校订《周礼正义》记录,直至八月十四日“同恺兄谒仲颂先生,袖所校《周礼正义》第廿一卷还之”。刘绍宽在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七日与孙诒让的第一次见面,即有问学记载,“仲容先生言《周官》缺《冬官》,甚可惜,然《考工记》亦补得好。同冬官原官即考工记否,曰大概当是”。此后的交往中,刘绍宽也向孙诒让多有请益,但多限于实务处理方面。以至于孙诒让光绪三十四年(1908)去世后,刘绍宽发出“孙仲师在时,未尝以《周礼》一书中之疑问庐请指教。师歿后,乃始得全部读过。于《礼经》未能兼综条贯,致为憾也”的悔叹。

令后学缅怀的孙诒让

光绪二十八年(1902)正月廿一日,林骏因为“礼书房缺,须补清书一名”一事请孙诒让帮忙,“适门人季芑至,嘱其向仲容先生借光,不允”,至有“世路险巇,人心变幻,生乎斯世,几如巢幕之乌”的感慨,对孙诒让显然有看法。但林骏不是记仇的人,光绪三十四年(1908)三月廿五日“闻孙籀廔先生陡中风寒,得悉极危。余心彷徨不已,先生为吾郡学界第一人,远近瞻仰,文名甚噪”,这种忧心是真诚且感人的。五月廿二日“孙仲容先生于是日上午九点钟仙逝,合邑大小学校,为之辍课半天,以表举哀之意。先生经学湛深,著作甚富,声名籍籍,远迩皆知,甲子初周,遽捐馆舍,哲人云逝,良可痛也”,林骏为孙诒让的去世感到痛心疾首。至于刘绍宽对孙诒让的感情,可以从其对孙诒让的称呼“孙丈”“孙仲丈”“孙仲师”“仲容师”“仲师”“籀师”等不难看出他的“心向往之”了。而且在孙诒让去世多年后,刘绍宽还在日记中经常提起他的“仲容师”,直至其生命最后一年1942年的1月15日还有关于孙诒让的记载,刘绍宽对孙诒让的缅怀之情可谓绵绵无期矣。

何思源不落井下石

□唐宝民

民国时期,军阀韩复榘原在河南省政府担任主席,后被平调到山东省政府担任主席。他在山东省政府组建的班底,大多数人员都是从河南带过来的,唯有著名教育家何思源是来自南京方面的。

韩复榘是一个热心教育的人,因为不清楚何思源的底细,就对他进行了一番试探,结果发现何思源是真心办教育的人,就让何思源放手去做,对他的工作从不干涉,给了何思源一个宽松、自由的教育环境。

1938年,蒋介石出于铲除异己等原因,想要杀掉韩复榘,于是就开始搜集韩复榘的罪名。学者

王鑫在《重回民国上学堂》一书中记述道:“此前,蒋在搜集韩复榘的罪名时,就曾召见过这位南京钦定的教育长官何思源。蒋介石问:‘韩复榘欠你多少教育经费?他又是怎样卖鸦片的?’何思源面对诱导,从一个教育者的良知出发,他并没有落井下石,而是直言相告:‘韩复榘从未欠过教育经费,也并没有出卖过鸦片。’。”

落井下石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之一,即所谓墙倒众人推、鼓破万人捶。但在韩复榘即将倒台的时候,何思源却襟怀磊落、实话实说,没有对韩复榘落井下石,没有为了讨好最高领袖而去污蔑一个“死老虎”,表现出了公正无私的人格操守。这种为人处世的态度,让我们看到了一位爱国民主人士高贵的良知。

钱钟书的愧悔

□张达明

吴宓与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私交很深,当年吴宓曾让钱钟书在清华旁听一年,还亲自辅导他外语。1929年,钱钟书以英文满分的成绩,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,成为吴宓的得意门生。钱钟书上课从不记笔记,总是边听课边看闲书或作图画、练书法,但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,甚至在某个学年还得到清华超等的破纪录成绩。吴宓对这个天才弟子“青眼有加”,常常在上完课后“谦恭”地问:“Mr. Qian的意见怎么样?”对于老师的询问,钱钟书总是不屑一顾。吴宓也不气恼,只是领首唯唯。

1933年,钱钟书即将从清华外文系毕业,冯友兰亲自告诉他,将破格录取他留校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。钱钟书却一口拒绝,并狂妄地说:“整个清华,叶公超太懒,吴宓太笨,陈福田太俗!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!”有人将这告诉了吴宓后,他则笑了笑,平静地说:“Mr. Qian的狂,并非孔雀亮屏般的个体炫耀,

周有光住院被“围观”

□刘跃

周有光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,是“汉语拼音”的创始人之一。他于2017年去世,享年112岁,其高龄在我国学者中是极其稀见的。更难得的是,他百岁之后,依然思考不止,笔耕不辍。他的长寿或许得益于母亲的遗传,但与他性格中的宽厚豁达、开朗随和、幽默风趣不无关系。

2003年岁末,周有光大病一场,紧急住进了北京佑安医院。当时他已是98岁高龄,却面相很嫩,皮肤白里透红,显得特别年轻。入院不久,医

院里打水的、扫地的、送饭的,乃至左邻右舍能走动的病人、不能走动的病人的家属或看护,全都知道医院里住进来一个“面相特嫩”的百岁老人,纷纷好奇地来到窗外一饱眼福,周有光高兴地说:“我是大熊猫,让他们来看吧!”住院期间,他常常一手输液,一手持报而读,读得最多的是英文版的《新闻周刊》,这又成了医院的一大新闻。出院后,他在给九妹周俊人的信中写道:“新年是在医院过的。医院送我一个大蛋糕,一大盆花,还有其他玩意儿。我成为医院的观赏动物,大家都来看这个高龄的稀有品种。”此时又幽默了自己一默。

要对每一笔负责

□任万杰

李嵩生活在南宋,非常爱画画,师从画家李从训。李从训很喜欢他,收李嵩为养子。李嵩绘画上得其亲授,擅长人物、道释皆知,尤精于界画,为光宗、宁宗、理宗时期画院待诏。

李嵩受李从训影响,主攻的是下层社会生活的风俗画,学了几年之后,虽然绘画技巧都学会了,可是李嵩总感觉不满意,至于欠缺什么自己也不说清楚。有一次,李嵩看着李从训在后院种庄稼,感到很好奇,因为李从训在画院工作,收入很高根本不需要自己亲自耕种。就问李从训:“父亲,如果为了贴补家用,我这里还有一些,为什么

要这么辛苦呢?”李从训说:“孩子,你这份孝心为父很感动,但是为父种地不是为了那微薄的收成,而是为了切身感受。”李嵩问:“义父您也不当农民,感受什么呢?”李从训说:“我们是画家,画的是下层社会生活,就要对每一笔负责,如果不亲自耕种,是无法观察和感知到身体每一处的细微变化,那么画出来的东西,就非常失真,又何谈精品呢。”

李嵩大惊,立刻找到了自己画的不足,连连说受教了,从此一门心思扎根到下层社会的生产生活中去,最后,创作出《春溪渡牛图》《春社图》和组画《服田图》等,成为南宋著名画家。

做人能俯下身子,做事能亲力亲为,这样人的成就绝对错了。

乌镇徐氏与浔商之间的交往

◎ 史海钩沉 □蔡圣昌

古镇南浔和桐乡乌镇唇齿相依,水土相连。乌镇古称青镇,民国时期出了丝商巨富徐氏家族。

徐氏祖籍浙江上虞下管村,清雍正年间迁青镇(今乌镇)东栅,开设徐恒裕米行、香饼行等,发迹后分东号、中号、西号,尤以徐东号资产为最,成为乌镇首富。徐氏数代人为乌青两镇做了不少慈善事业,如创办留嬰善堂、敦本小学,倡修古迳寿圣塔、分水墩等等。

乌镇徐氏到了徐晓霞、徐冠南这一代,成为海上巨商。徐晓霞的主要产业为丝业,并在沪开设宝大裕、宝兴钱庄等,又为安平水火保险公司监事。他精通文墨,尤喜金石书画及文物收藏,与王国维、张元济、吴昌硕以及南浔丝商刘承干、张均衡交厚,成为一代儒商。徐晓霞原名徐钧,字晓霞,其父徐焕谟(1851~1879),附贡生,两应乡试不中,抑郁而卒,年29岁。徐晓霞生于1877年,父亲病故时,他只有2岁。

徐冠南为徐晓霞堂兄,父亲徐焕藻(字茗香)和徐晓霞父亲徐焕谟是亲兄弟。徐冠南,原名徐棠,字公棣,号冠南,光绪二十年举人,在上海从事银行业和房地产,居上海宁波路乾记衙,通过捐款捐地争得以“乌镇”命名的路名。

据有关文献记载,徐家和南浔丝商的交往历史悠久,早在刘镛和张颂贤这一辈就开始了。据刘承干《求恕斋日记》记载,1912年12月

13日,他和一帮朋友来到宁波路的乾记弄参加由徐冠南做东的消寒雅集:“是集诗题系冠南以颐园永怀图图案,颐园者在青镇东隅,为冠南尊人茗香烟丈老年颐养之所也。”刘承干当时写了这几句诗:“芙蓉浦外柳依依,我欲来敲白板扉。入画亭台供玩赏,披图棣树认依稀。苔岑话适先人谊,粉社闲抛旧钓矶。”刘承干诗后注道:“茗香烟丈与先父刘镛交谊素挚,时相过从,余幼时曾见之。”此处的茗香烟丈即是指徐冠南的父亲徐焕藻。分析刘承干此文不但知道刘徐两家的交往从刘镛这一辈即开始了,而且交往密切。同时也得知刘承干和徐家有姻亲关系。

又据刘承干日记记载,刘承干的岳父钱绍桢经常来往于嘉善和上海,到上海以后每一次都是住在徐晓霞家里,刘承干去看望岳父也即到徐晓霞家。“至晓霞处,谒外舅外姑。”这样的文字比比皆是。又据资料记载,徐晓霞于光绪二十三年(1897)娶嘉善钱氏为妻。因此可以推断,刘承干和徐晓霞应该是连襟关系。嘉善钱氏还有一个大官即钱能训(1870~1924),他是清朝进士、翰林,曾经以布政使身份出任陕西巡抚。徐世昌任北洋政府总统时其为国务总理。刘承干在日记里称钱能训为叔岳,叔岳就是老婆的叔父。1924年农历6月13日,钱能训病故,灵柩从北京经火车运至嘉善,刘承干和夫人钱德璋以及徐晓霞夫妇一起至上海车站公祭。

徐晓霞没有刘承干富裕,他有时会跟刘承干借钱。有一次,徐晓霞借的2万元欠款到期了,徐晓霞的意思是再续借一年,刘承干下头

的账房为刘承干着想,意思是收回来,刘承干就来一个折中方案,转一半,还一半。须知2万元在当时是非常巨大的数目,刘承干曾经在那年请过一个家庭教师,每个月支付工资才12元,由此也可以看出刘家和徐家的友情。

徐家和南浔其他丝商也关系紧密,尤其是张家。徐晓霞上头还有四个姐姐,其中二姐徐戚安嫁了张颂贤的孙子张均衡(即张石铭)。张石铭和徐冠南又是同一年中举。徐戚安一共为张石铭生了七个孩子,其中最小的儿子叫张乃骥,张乃骥又娶了舅舅徐晓霞的女儿徐懋愔。

徐氏兄弟民国初年即在上海生活,期间刘承干和张石铭等也在沪上居住,同为丝商,也为同乡,而且他们四人对古文献有共同的嗜好,使他们成为密切交往的朋友。《求恕斋日记》里这样的文字记录很多:“1914年6月20日,夜至四马路春江楼,应徐冠南、晓霞之招,同坐者为杨雨辰(德利洋行)、佩瑜、张石铭、邢颂声、金仲廉叔初及主人而已。”“农历1914年6月21日,出至小花园别有天,应金仲廉叔初之招,同坐者为杨雨辰、佩瑜、张石铭、邢颂声、袁仲龙、蒋孟蘋、徐冠南、徐晓霞及主人而已。”“1914年9月初七,晚至迎春坊田金凤家宴客,孙锦馨、沈醉愚、钱履樛、张石铭、弁群、淡如、徐冠南、晓霞、赵问轩、沈季璋,计两桌。”农历1915年正月26日徐冠南五十寿,刘承干也去祝贺。

以上记录只是很小一部分,但是可以看出,刘承干、张石铭、徐冠南、徐晓霞他们四人的交往非常密切,且非常频繁,几乎过几天就要聚一次,而且每一次聚会四人都会到场。

◎老照片 每一幅照片背后,都有一个故事
每一个故事后面,都有一段历史



职工群众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,全国各地兴起了学习三中全会精神的热潮。黄岩县总工会开办政治夜校,组织职工群众学习三中全会精神,为企业培养改革开放的生产管理人才。照片摄于1979年。

照片提供者:黄政